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马关条约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一、战败后的屈辱

这是 19 世纪末震惊世界的一幕。

1895 年 3 月 24 日，日本广岛马关春帆楼附近。

这天下午 4 时 15 分，中国的全权议和代表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结束第三次谈判，自春帆楼乘轿返回寓所途中，亦即 4 时 30 分，一名暴徒突然冲到轿前，乘轿夫卫士尚未反应过来，“砰”一声，一粒子弹击中了李鸿章的左颊。李顿时血流满面，一度不醒人事。受害者虽然没有死，但不得不通知日方“不能出席定于次日开的会议”。

一个外国使臣被所在国的国民刺伤，实在是一件丑闻，国际舆论为之哗然。日本政府也极为狼狈。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担心发生意想不到的危机：“若李鸿章以负伤为借口，中途归国，对日本国民的行动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他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假如“引出欧洲列强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

按理说，清廷和李鸿章本人应充分利用这一事件压制日本争取外援，以“酿成国际异变”。可悲的是，中方没有这样做。

在李鸿章受伤前，日本的策略是，一方面在谈判桌上对清使进行恫吓和要挟，一方面仍然派兵攻打中国的澎湖，以加重谈判桌上的筹码。清廷恰恰最怕的是战争继续打下去，因此，迫切希望早日停战，一切回到谈判桌上来，行刺李鸿章的事件发生后，日本顾及其他列强干涉，以退为进。伊藤、陆奥亲临病榻慰问李鸿章于前，天皇降诏严惩凶手于后。尽管李鸿章看出日本“上下礼谊周至，不过敷衍外面”而已，自己却压根儿没打算中途退出谈判，以示抗议。3 月 28 日，当陆奥再次亲至李鸿章寓所，通知日方已允诺停战时，“绷带外面仅露一眼”的李鸿章，竟“露出了十分高兴的神情”。

就这样，日本担心的一场风波，化险为夷了。

谈判继续进行。

4 月 1 日，伊藤拿出了和约的底稿。李鸿章看后为之愕然。他没想到日方的贪欲竟这么苛刻：要求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要求中国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要求中国赔偿日本军费银 3 万万两；要求缔结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开放北京等 7 处为通商口岸；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设厂从事各种制造，并能输入机器等等。

尽管是全权大臣，李鸿章也不敢作主吞下这个苦果。他明白，签字后的条约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为了让每一个字都让皇帝知道，李鸿章在即日傍晚就将约稿电达北京。

伊藤等得不耐烦了。4 月 6 日，他发出照会，催促李鸿章、勿再延缓”，尽快对日方约稿作出明确答复。

李鸿章又电告北京：“鸿断不敢擅允，惟求集思广益，指示遵行。”

其时，清廷决策层人士对日方约稿仍态度不一。

皇室要员，当时的外交机构——各国总理事务衙门的主管恭亲王奕䜣和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主张割台保奉，尽快议和。

帝师翁同龢力言“宁以款偿，不可割地”，与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䜣发生龃龉。

光绪皇帝从感情上是倾向翁同龢的，但究竟采纳谁的意见，一时作不出

抉择。4 月 7 日，只好让总理衙门电告李鸿章：奉天和台湾，“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

明眼人看出，这封语意含糊的电旨，暗寓“极尽驳论尚不能”时，可以弃地。

日方截获了这份密电，完全摸清了中国的底牌。

4 月 9 日，李鸿章将和约修正案交给日方。

4 月 10 日下午 4 时 15 分，中日全权代表又在春帆楼开始第五次谈判。

闲谈片刻后，伊藤拿出对中国修正案的复文，要求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赔款 2 万万两，并蛮横地告诉李鸿章：日本“已让至尽头”，中国“只有同意不同意这两句话！”

李鸿章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伊藤“悍然不顾”，进而威胁说，中国若不同意，日本决意再战，眼下广岛已有六十只船舰做好了出征的准备。“中国全权大臣一旦离去此地，是否再能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不能保证。”

会谈到 6 时 30 分结束。

回到寓所，李鸿章马上急电北京，说自己已“力竭计穷”切盼皇帝降旨明示。

次日，伊藤又致函李鸿章，声称昨日所交和约条款，“实为尽头”，“中国或允或否，务于四日内告明。其四日限期，系从昨日算起”。

4 月 12 日，焦急中的李鸿章盼来了北京的回电。光绪指示他继续与伊藤“磋磨”，争取减少赔款，“允其割台之半”，但辽东半岛的“牛庄营口在所必争”，倘若实在无法商改，同意“即与定约”。

4 月 13 日，李鸿章连复三电，强调日方“词气极迫”，已没有回旋的余地，要是不按时定约，京师难保。

到此刻，清廷彻底打消了讨价还价的念头。4 月 14 日，光绪回电李鸿章，说原希冀争得一分之益算一分，现在既然难以商改，就遵旨与之定约吧。

大概是出于履行皇帝能“争得一分有一分益”的指示的考虑吧，李鸿章在 15 日进行的第六次谈判中，又不惜费尽唇舌，向伊藤苦求将赔款从 2 万万两减至 1.5 万两或 1.75 万两，并希望以“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作为一个外交官，李鸿章这种举动，不免有点失态。

4 月 17 日上午 10 时整，中日和议第七次会谈，亦即最后一次会谈又在春帆楼开始。实际上，这次会议“不过是举行一种签字仪式而已”（陆奥语）。11 时 40 分，当李鸿章和伊藤分别代表本国在和约上签完字时，伊藤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根据这个和约，中国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

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银 2 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各口；日本臣民可以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工业品，并征得免征一切杂税……

这就是割我沃土、索我巨款、毁我经济的《马关条约》（又名《春帆楼条约》）。仅赔款一项，就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收入的三倍，相当于北宋政府向辽、金缴纳的“岁币”的一千倍。它却大大滋养了日本。据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透露：“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几亿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 8 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 1.5 亿日元滚滚而来，

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

它是一个罪恶的里程碑！

打这以后，中华民族就进一步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事既至此，李鸿章作何感想呢？他会认为这一灾难是由他个人造成的吗？他会自责吗？

还在东渡日本之初，他就意识到这是一项屈辱的使命，是一项“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咒骂，也许还要受到政府的公开谴责”。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证明，这次交涉确使李鸿章“一生事业，打地无余”。当画押的消息传到京都时，内至宗室王公、部院、谏垣，外至直省督抚、一般士大夫，“莫不交章谏阻”，把一腔怨愤倾洒在李鸿章一人身上，形成一种“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的局面。

人们的指责公平吗？李鸿章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若把一切罪过都归咎于李氏一个人——时人的意气显然多于冷静的分析。

要知道，李鸿章是战败国的使臣。战败国在战场上失去的东西，是很难在谈判桌上挽回的。在谈判桌上，李鸿章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资本。尽管他使尽了浑身解数，到头来还是饱尝了种种屈辱。他是在征得皇帝的同意后，才被迫吞下这个苦果的。

其实，这个苦果早在李鸿章出使前，日方就给准备好了。签字画押的罪名不是由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吞下，就会由另一个使臣来吞下。可历史老人，偏偏让李鸿章充当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

不是么？

本来，清政府起初是派遣张荫桓和邵友濂赴日乞和的。那是 1894 年隆冬，当清廷意识到打了五个月的中日战争已威胁到京都的安全时，遂于 12 月 20 日作出了这一决定。

按照国际惯例，交战国双方若开始和谈就应实行休战。清政府也满以为和谈一开始，双方即可停战。可日方却通知中方：停战时间“须在两国全权委员会商后，始能明言”。

对于日本这种违反国际惯例的做法，软弱的清政府竟屈辱地默认了。

紧接着，清政府要求日方提供谈判代表的名单，不料日本又我行我素，一口加以拒绝。此事连从中调停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也感到未免过分。他说：“显而易见，日方的这种做法是想继续侮辱和打击中国，并以使中国丢脸而为乐”。

1895 年 1 月 26 日午夜，亦即旧历春节那天，张荫桓、邵友濂等一行怀着颓丧的心情乘船离开上海。经过两天两夜的漂泊，1 月 28 日到达日本长崎，30 日转神户，次日来到谈判地点广岛。

日本把广岛定为谈判地点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按照美国人的说法，他们是想把中国的代表孤立起来。这是一座防御工事非常牢固，并且有重兵把守的城市。中国代表一到那里，“将被监禁起来”。

在张荫桓一行到来的前一天，亦即 1 月 27 日，日本大本营连忙召集当时在广岛的阁员及高级幕僚，就两国媾和问题举行对策会议。刚刚上任的参谋总氏陆军大将小松彰仁亲王、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海军司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此次中日两国开战主因之朝鲜独立、割让土地、赔偿军费及将来帝国臣民在中国通商航海之利益等问题为重点”的媾和条约

方案。明治天皇阅览后，立刻加以批准。31 日，又任命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为日方全权代表。

正像美国人预料的那样，张荫桓一行在广岛的处境，果真恰似囚徒一般。中国书信往来，日人“ 先拆阅而后送 ”。首席代表张荫桓想往北京寄密电，日方不允许。清廷来旨，也扣压不送。中国使节提出交涉，日方竟蛮横地回答：中方代表要想给国内寄密电，必须先把密码“ 书送交译 ”日方看后，“ 方可接递 ”。中方头等参赞官伍廷芳看到中国使节蒙此耻辱，不禁感叹道：“ 我将卒苟能奋勇于疆场，不容其猖披，何致就彼而受此欺慢？欲消此恨，其在将与兵焉！和局易成与否，亦在战争之胜负判也！ ”

就是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中，中日和谈拉开了序幕。

2 月 1 日上午 11 时，中日两国代表会晤于广岛县厅。双方交换全权证书时，伊藤和陆奥“ 发现 ”张荫桓、邵友濂的全权证书中有“ 妥商一切事件 ”，须“ 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 ”的限制，遂断言清使无全权，拒绝进行会谈。其实，这种发难是没有道理的。所谓“ 全权 ”，伊藤和陆奥的证书也不完全，明治天皇颁给他们的证书中也有“ 所议定各条项，候朕亲加检阅，果真妥善，即便批准 ”的限制。可是，日本乐于过分扮演战争胜利者这一角色。在他们看来，随之而签订的一切条约必将是强迫的结果，先侮辱一下清使有什么不可呢？

日方虽拒绝了中国使节，但没有清廷的命令，张荫桓一行是不敢擅自回国的。然而日本又以屯兵为由，不准他们在广岛置留。张荫桓一行只得于 2 月 4 日沮丧地离开广岛，到长崎静候清廷指示。

“ 战事屡败，使臣被逐 ”，“ 中国体面安在？ ”慈禧太后在 2 月 6 日对枢臣们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但是这个对内说一不二的铁女人，对外却怎么也硬不起来。考虑到所谓社稷大业，祖宗江山不致毁掉，唯有逆来顺受，继续忍受“ 挫辱 ”。于是，当日改国书，授予张荫桓、邵友濂具有签字画押的全权，并将“ 批准 ”二字也轻笔点出。

尽管如此，日本仍将张、邵拒之门外。2 月 9 日，日方通过美国人谭恩转电北京：“ 虽允可再开商和议，总须中国派从前能办大事有名之员，给予十足全权责任，方可再行开办。 ”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只好下令召回张荫桓和邵友濂。

那么，改派谁为新的全权使臣呢？

还在张荫桓离开广岛前，亦即 2 月 2 日，伊藤就对中方谈判随员伍廷芳透露：贵国何不派恭亲王奕䜣和李鸿章来日议会？！恰在 2 月 17 日，也就是日军占领刘公岛、中国北洋舰队覆没的当天，日方又毫不掩饰地告诉清廷：中国所派亲大臣，必须有允偿兵费、朝鲜“ 自主 ”、割让土地及与日本日后办理交涉能画押的全权。

正是屈服于日方的这些压力，担心王朝覆灭的清廷重新起用刚被撤职的李鸿章出任全权议和大臣。

李鸿章等人 3 月 19 日抵达日本马关后，次日便进行了第一次谈判。3 月 21 日又进行了第二次谈判。3 月 24 日刚结束第三次会谈，就发生了李鸿章被刺事件。

日本人为什么要行刺中国的首席代表李鸿章呢？凶手小山丰太郎在供词中宣称：“ 日军放弃占领北京是意味着日本的耻辱，日前同中国签订和约为时尚早。 ”看来，他行刺李鸿章，是旨在阻止和谈，使战争继续打下去。

小山丰太郎的这种歇斯底里症在日本决非孤例。当时日本国内希望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的人是相当多的。尤其是在军队内部，主战的空气甚浓，有人狂言非占领北京不可言和。在日本将领所写的诗中，多有“燕京从是几行程”、“何时轻骑入燕京”的侵占北京的诗句跃然纸上。 2 月 21 日，当李鸿章要日方停战的要求被拒绝后，日本报纸马上反映出继续扩大战争的调子。诗人山田松堂写道：“三军万里向天津，正是东风桃李辰。星使乞和和未就，燕京将属于中春！”

由此可见，即使在议和的日子里，日本仍被那种“须有瓜分四百余州的决心”的扩张主义流行病笼罩着。

二、蓄谋已久的野心

1895 年 4 月 20 日，当北方的春天仍被黄尘风沙笼罩着的时候，李鸿章回到了中国。他自大沽乘马车返回行辕天津途中，望着身后滚滚的黄尘和路旁被呼啸的北风吹得摇摇摆摆的柳树的刹那间，不禁百感交集。“卖国贼！”一想到这个不光彩的字眼，他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颤。他甚至不敢进京述职，只得让随员杨福同星夜赴北京送约本至总理衙门，并代他请了 20 天假。

按照国际惯例，李鸿章虽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但正式生效，还须由清廷最后批准施行换约手续。对于要不要批准换约，清政府内部几位决策人士在御前会议上又争论了一番，因实无良策，遂派伍廷芳和联芳赴烟台完成这一手续。5 月 8 日晚，当时钟指向 10 点时，伍廷芳与日方代表伊东在顺德饭店互换了条约文本。至此，一场生与死的搏斗以中国的屈辱降下了帷幕。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自 1840 年以来，中国先败于英国，继又屈服于法国、俄国和美国，如今“弹丸岛国”日本也迫使中国吞下这一苦果。如果说，有感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部分国人以为中国败于英、法还情由可原的话，那么，同种、同文、同洲的日本——昔日向为我鄙视的“岛夷”、“弹丸岛国”竟让我华夏大丢其脸，就难以理解和接受了。

不过，感到突然也罢，难以理解和接受也罢，这毕竟是事实。而对日本来说，则是实现了蓄谋已久的野心。

本来，在 19 世纪 40 年代以前，中国和日本的社会状况差不多，而且准确地说，中国在不少方面领先于日本，一直扮演着老师角色。但自近代以来，中国逐渐堕入半殖民地深渊，日本却经过 1868 年的明治维新，变封建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建成亚洲唯一独立自主的近代资产阶级国家。

明治维新虽使日本走上了富强之路，但也遇到了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存在，使资本赖以生存的国内市场变得狭小；政府想大力扶持资本主义工商业，又苦于缺乏雄厚的资本。另一方面，新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使濒于破产的下级武士陷于绝境。他们的不满与日俱增。倘若找不到妥善的安抚办法，武士们有可能发生叛乱。为解决这些难题，明治政府逐步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究竟向哪儿扩张好呢？还在明治维新之前，有个叫吉田松荫的就曾向幕府建议：在对外方面“交易上失之于美、俄的，应用朝鲜和中国的土地作为补偿”。胜海舟和山田方谷也向幕府建议：“转内讧为外征，把士气转对外。”

这些人的扩张言论，给刚刚诞生的明治政府以很大影响。其实，说穿了，这些建议，也正中维新政府的下怀。明治天皇在继位时的《御笔信》中就明确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更何况，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开国元勋又都是吉田松荫的门徒。伊藤博文在吉田讲学的村塾中曾题诗道：“道德文章叙彝伦，精忠大节感神明，如今廊庙栋梁器，多是松门受教人。”

就在这一年——明治初年，日本制定了所谓大陆政策，明目张胆地宣称“为了征服中国，我们必先征服‘满蒙’；为了征服世界，我们必先征服中国。”随后又将这一构想具体化，强调在实战中以夺取朝鲜作为“渡满洲的桥梁”，以占领台湾作为向东南亚扩张的基地。

打这以后，明治政府对中国、对朝鲜这盘棋的着法，都是围绕着这一野心投子的。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人也懂得这个道理。

1872年9月，日本当局派遣池上四郎、武市正干等人到中国来从事间谍活动。他们化装成商人，从上海乘船经烟台到营口，然后往奉天“旅行”。当时清政府地方当局对他们的行踪感到可疑，始终派人尾随加以监视，并一再盘问他们来华的目的。他们总是以“看看有什么感兴趣的贸易，参观来了”来搪塞。涉及政治问题时，就以“我们是商人，什么也不懂”来遮掩。尽管清朝地方当局对他们进行监视，但他们还是获得了不少重要情报，如辽河几月几日开始封冻，何时人马可以从河上往来，何时解冻等等。在他们回国后写的报告书中还有这样的内容：“满洲的常备军积弊日久”，“士兵怯懦”，“常备军几乎徒具虚名”，“经过几年支那肯定土崩瓦解”。

第二年，海军少佐桦山资纪和陆军少佐福岛九成也来到华南，企图对台湾进行侦察。只是由于清朝地方当局警戒甚严而未得手。不久，福岛摇身一变，成为驻福建厦门的领事。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日本画家安田老山。安田正在向中国名画家胡公寿学画，漫游于闽浙山水间。在安田的掩护下，福岛潜入台湾，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风土人情进行了实地勘测。

1886年日本参谋本部又派遣服役中的陆军中尉荒尾精来到中国。荒尾脱去军装，化装成平民，乘轮船混入上海。在上海他首先拜访了经营眼药水和杂货的乐善堂上海分店主人、著名日本商人——岸田吟香。岸田侨居中国30年，结交了一大批朋友，成为沪上名人。在岸田的帮助下，荒尾在汉口开办了一处间谍机关——乐善堂分店。表面上，那是一家中西风格二层建筑的百货商店，内部却紧张地干着搜集中国情报的勾当。

随着日本当局对中国情报的强烈要求，在华情报网也逐渐扩大。不久，荒尾又在湖南、四川、北京设立支部。为了便于侦察，他们从装束、发辫到语言都仿照中国人，并以江湖各种职业为掩护，流窜到中国内地各省。

据说，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当局已通过在华间谍，对清军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一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他们还绘制了包括朝鲜、东三省和渤海湾在内的军用地形详图，上面标明着这些地区的每一座小丘和每一条道路。有一个叫波纳尔的欧洲人曾经获得一份这样的地图，他后来十分肯定地指出：“这份地图本身就是日本人久已蓄意侵略中国的证据，它驳斥了日本当时是被迫作战的说法。相反地，那是一次有意图的、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

和派遣间谍相比，日本当局更注重在国内加快扩军备战的步伐。1878年12月，政府撤销了受内阁统辖的“参谋局”，代之以不受内阁控制而只从属天皇的最高军事机关“参谋本部”。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表明日本已下了同中国和朝鲜开战的决心。

参谋本部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调查中国的军备和地理。1880年正式编成《邻邦兵备略表》六册。该部部长山县有朋在进呈时，竭力鼓吹以打败清政府为主要目标，并强调充实军备是当时“燃眉之急”。

1887年参谋本部又拟定出《征讨清国策》。计划一旦战争爆发，以大部分兵力进攻北京，以部分兵力占领长江流域的战略要地来阻止江南清军北上救援。如能战胜中国，那么，包括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舟山群岛、台湾、澎湖列岛和长江两岸十里左右之地，均划归日本版图；另外还将中国的其余地方，分割为东北、江南、华北、青藏、内外蒙、甘肃、准噶尔等几个小国，分别附属于日本。

就在这年 3 月，明治天皇还特颁了“ 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 ”的敕令，除发行 1700 万日元海军公债外，又拨内币 30 万，赠给海军，充作造船之用。伊藤博文也号召“ 爱国志士 ”以天皇为榜样，进行捐献。在他的鼓动下，半年内得到海防捐款 203 万日元。

1892 年 7 月，中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曾率领“ 定远号 ”、“ 镇远号 ”到日本横滨访问，并在舰上招待了一些日本议员。参加过当时招待会的法制局长尾崎三良后来这样写道：“ ‘ 定远号 ’放出小艇迎接，先登‘ 定远号 ’。丁（汝昌）、李（经方）两人在舰门迎接来宾，一一握手。随即由向导带领巡视舰内上下各室。巨炮四门，直径 1 尺，长 25 尺，当时尚为我国所未有。……舰内清洁，不亚于欧洲。中午 12 时进午餐，下午 1 时半离舰辞别。此时，鸣礼炮 21 响送行登陆。同行观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皆卷舌而惊恐不安。 ”

看来，这件事对日本当局的刺激不小。这以后，日本进一步加速军备整顿。1891 年 11 月，陆军少将村田经芳把以前的单发枪改进为连发枪。1892 年，军费开支竟占国家总预算的 11%。1893 年 3 月，海军技术员下濑雅允发明了高性能火药。

据消息灵通人士观察，到 1893 年底，日本已完成了扩军备战的一切准备。海军包括松岛号等大型装甲舰和巡洋舰共计 28 艘（另有鱼雷艇 24 艘），6 万吨位。当役陆军和后备共达 22 万人。战时大本营也于 5 月 19 日正式成立。伊藤博文的密友、英国《泰晤士报》驻东京记者布林克莱看出，日本在军事上一切准备就绪，单“ 就弹药而沦，它所储存的数量，比在一次对华战争中可能耗去的还要多 ”。

有位美国外交官说过，和富绕广阔的中国相比，日本酷似一个囚笼。日本当局这头恶兽要跳出“ 囚笼 ”到广阔的大陆觅食，当然渴望得到本国国民的理解和支持。为此，当时任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在 1890 年隆冬所作的施政演说中公然抛出了“ 大陆是日本生命线 ”的侵略理论。他向议会说，日本必须在领土疆域的“ 主权线 ”之外，再划一条“ 利益线 ”。所谓“ 主权线 ”就是指日本本土，所谓“ 利益线 ”就是指中国和朝鲜。他指出，“ 在当今纷争时代，仅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 ”。由于他的煽动，东邦协会、东洋俱乐部、殖民协会等一批以向大陆扩张为职志的军国主义团体相继在日本出现。

本来，一般日本国民对中国“ 丝毫也不抱有憎恶之感 ”。但由于日本当局有意制造所谓“ 忠君爱国 ”、污蔑中国人的气氛，不少日本人开始鄙视中国。一位身临其境的日本国民后来回忆道：那时的学校到处喊忠君爱国，侮辱中国人的口号。“ 用金色的封皮刻有菊花纹章（象征着日本皇室）的小册子，原是赐给军人的敕谕 ”，从那时起“ 从小学开始就赠送给每个学生 ”。尤其是“ 战争开始后不久，漫画也罢，歌曲也罢，都反映出对中国人的憎恶。……我们认识了日本人的价值。不，与从前相反，是把日本人看得过于高贵了吧。 ”

1894 年 3 月 27 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写信给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说：“ 国内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政府若不作出某种使人心为之一振的事，则无法使慌乱的人心安定下来。 ”原来，伊藤首相与议会的关系陷入僵局，议会将通过对政府不信任案，伊藤内阁面临着总辞职或再度解散议会（已解

散过两次）的抉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对国内现状的不满中转移出来”，一批执政的军国主义分子“宁愿欢迎对华战争”。陆奥宗光曾担心“毫无借口就发动战争是不可能的”，但恰在这年5月间，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对伊藤、陆奥这些人来说，仿佛是“欲渡河而船来”，于是故意揪住不放，照陆奥宗光的话说，“索性使两国（中日）关系破裂，一变阴天，使降暴雨”。

三、血染旅顺口

果然，1894 年初夏，中国落入了日本预谋的所谓“代为戡乱”的圈套。

此前，朝鲜当局向清政府乞援，要求派兵镇压东学党人领导的农民起义。

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杉村浚按照东京指示，诱劝请朝驻朝鲜通商大臣袁世凯采取积极行动，并声言日本无意干预此事。

值时，负责中国外交的李鸿章信以为真，遂于 6 月初派兵东渡赴朝。

日本获悉北京的情报后，马上以书面形式通过了出兵朝鲜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决定。6 月 5 日，又正式成立了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司令部长等参加的战时最高指挥机关——大本营。因此，当清军协助朝鲜当局扑灭东学党起义时，已有 8000 名日本兵出现在朝鲜土地上。

7 月 23 日，日军攻入朝鲜王宫，成立以大院君李是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

7 月 25 日，亲日的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所有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

同日拂晓，中国军舰“广乙”、“济远”在朝鲜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遭到日舰突袭。中国租用运兵的英商轮“高升”号被击沉，遇难的中国士兵达 700 余人。

7 月 29 日，日军再次袭击驻扎在牙山东北成欢驿的中国军队。

8 月 1 日，清廷被迫下诏宣战。同一天，日本天皇也下诏宣战。至此，日本蓄谋已久的对华战争便由不宣而战转为正式开战。由于这一年按中国旧历年是甲午年，这场战争就以甲午战争之名载入史册。在日本，则被称为日清战争。

双方宣战后，尽管清政府频频调兵遣将，但日军仍按其既定方针，光是平壤冒险成功，接着挑起黄海大战，遂后便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相继攻陷全州、大连湾、旅顺口、九连城、海城、威海卫，直至 1895 年 2 月全歼北洋海军，4 月 17 日威迫清廷议和代表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画押。

战争结束时，日本侵略者像屠夫似的带着中国的血和肉狂笑着去了。

清朝统治者，尤其是慈禧一伙似乎只觉得虚惊了一场。而中国人民，特别是那些饱经战火摧残的人们，则永远记下了日军犯下的暴行。

血染旅顺口，可谓日军滥杀无辜的一个缩影。

那是 1894 年 11 月 21 日，日军攻陷了旅顺市区。面对上自白发苍苍的老人，下到嗷嗷待哺的婴儿，这些丧心病狂的入侵者，竟兽性大发，进行了四天三夜的野蛮大屠杀。

许多目击者记下了当时的一幕幕惨景——

有位叫艾伦的英国海员在《旅顺落难记》一书中这样描述道：

“在我周围都是狂奔的难民。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日军很快地遍布了各街，击毙所有遇见的人。在街道上行走，脚下到处踩着死尸，而且遇见成群的杀人凶手的危险的可能性每时每刻都在增加。我一再地目击日本兵的残杀行径，并屡次看见他们用排枪向胡同里扫射。”

“在一家钱铺柜台的木栅栏尖上，插着无数人头。地板上的血有三寸厚，尸体重重叠叠。更残忍的是，日军将一个未满周岁的小孩活活钉死在墙上。那零零星星的手、脚、头，到处都是，日军还把许多逃难的中国人逼到大坞后面的水泡子里，然后用洋枪打，刺刀捅，尸体一层层，水湾子变成一片血

海。”

“天已经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枪声、呼喊声、尖厉的叫声和呻吟的声音，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尸体堵住了。死者大部是城里人。”

艾伦的这段记载，今天读来仍令人发指！

一批西方新闻记者，如英国《伦敦时报》记者柯文、《黑白画报》记者兼画师威利阿士、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等也是日军屠杀的目击者。克里曼在 11 月 24 日从旅顺发回国内的一篇颇为著名的通讯中写道：

“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无抗拒犯军。日人谓枪弹由窗及门放出，尽是虚语。日兵并不欲生擒。我见一人跪于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上，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

“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一无衣服之婴孩，其人急走，将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之刀者即时擒住其背。此虽谓之战，惟不过野人之战而已。……日本统师与其分统，非不尽知连日屠杀。……”

除新闻记者外，还有一些欧美的武官也记下了屠杀的场面。美国海军上尉欧伯也在给该国政府驻日公使谭恩的报告中写道：

“我亲眼看见一些人被屠杀的情形。这些人本来是可以作俘虏的，他们不但没有抵抗，而且显然是没有武装的，……我又看见一些尸体，双手是绑在背后的。我也看见一些被大加屠割的尸体上有伤，从创伤可以知道他们是被刺刀杀死的；从尸体的所在地去看，可以确定地知道这些死的人未曾抵抗，我看到了这些事情，并不是我专为到各处看可怖的情况才发现的，而是我观察战事的……途中所看到的。”

英国《泰晤士报》也根据其本国武官的报告和记者的报道，说“日本攻取旅顺时，戕戮百姓四日，非理杀伐，甚为惨伤。又有中兵数群，被其执缚，先用洋枪击死，然后用刀肢解。……日本士卒行径残暴如此，督兵之员不能临时禁止，恐为终身之玷。”

就是包括某些日本人也留下了本国军队大屠杀的自供。一个名叫向野竖一的日谍在 11 月 19 日的日记中记述到：日军由营城子向旅顺进攻时，军官下达了“见敌兵一人不留”的命令。日军步兵第三联队十兵路过民家，见“有士人二”，“遂进去击杀之，鲜血四溅，溢于庭院”。“师团长（山地元治）见此景……表示今后不许轻易对外泄漏”。旅顺大屠杀后不久，向野还在一次内部谈话中透露：在旅顺，山地将军说抓住非战斗员也要杀掉。他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外全部剪除之命令。旅顺实在凄惨又凄惨。旅顺口内确实使人有血流成河之感。”

那些旅顺大屠杀的幸存者，更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揭露了日军的暴行。有位叫苏万君的幸存者在数十年后悲愤地回忆道：

“甲午战争时，我亲眼看见日本鬼子把中国同胞抓到后，用绳索捆绑起来，逼到大医院前砍头后，把尸体推到大泡子里，水泡子变成了一片血海。当时西大街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地堆满了尸体，……日本帝国

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我永远也不能忘记。”

一个参加过抬尸的水师营老人王宏照描述说：

“一天鬼子用刺刀逼着我们抬着四具尸体往旅顺走。看见旅顺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掉了头，有的横倒在柜台上，有的被开膛，肠子流在外面一大堆，鲜血喷得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都铺满了。”另一个被日军强迫收埋过死尸的老人鲍绍武也说：

“日本兵侵入市内，到处都是哭叫和惊呼声。日本兵冲进屋内见人就杀。当时我躲在天棚里，听到屋里一片惨叫声，全家被杀了好几口。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怀里吃奶就被捅死了。”

日军在旅顺四天三夜的野蛮大屠杀，当时就遭到世人的谴责。《世界》杂志说：“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今已摘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野蛮的真面目。”就连起初支持日本的英国法学权威胡兰德博士也在其所著《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一书中抨击道：“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除了战胜的当天以外，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尸体而被留下的。他们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免死。”

国际舆论的压力，确使日本政府有点惊慌。为了欺骗世人，陆奥宗光曾就旅顺大屠杀发表了一个声明，他一方面为日军的暴行辩护，说什么外国记者关于旅顺惨案的报道“是大加夸张渲染以耸人听闻的”，一面又谎称“旅顺陷落时，中国士兵看到公开抵抗是无用了，便抛弃他们的军服，穿上平民衣服，把自己化装成这个地方的和平居民的样子。”“在旅顺被杀的人大部分被证实是化装的兵士。这些事实的证据是：在所见的尸体上，差不多里衣全都有一些军服上的东西。”陆奥宗光的这个声明当然是不能掩盖其罪行的。

四、几幕悲壮的场景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无疑是一个大惨剧。但值得千古传颂的是，人们能从这场大惨剧中看到几幕悲壮的场景，尤其是可以从左宝贵、邓世昌、林永升、丁汝昌、杨用霖等爱国志士视死如归的壮举中受到极为强烈的感染。

“自从举命东征，誓当为国宣力，敌人悬军长驱，正宜出奇痛击，使其片帆不返，不敢窥觎中原。朝廷养兵岁靡金钱数百万，正为今日。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大丈夫建业立功、在此一举，成败利钝，不必计较。”——这是左宝贵 1894 年 9 月 2 日那天对清军主帅叶志超坦露出的几句肺腑之言。此刻，有一万多清兵守在平壤城内。而对各路日军即将发起的总攻，叶志超却不作认真布防，竟思忖着怎样弃城逃遁。在场的人看出，左宝贵对叶志超说那几句话时“怒形于色”。

9 月 15 日凌晨，日军对平壤发起了总攻。

到 7 时 30 分左右，日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包抄左宝贵驻守的牡丹台。牡丹台号称“天设险堑”，“巍然屹立于平壤城北角”，“垒壁高五丈，炮座完备，掩蔽极坚固”。驻守这里的左宝贵统领的一批奉军，配备三门野炮以及若干速射炮和七连发步枪等。日军首先用排炮对清兵进行轰击。奉军则凭险拒守，使其步兵不能向前越雷池一步。不幸的是，恰有三发榴霰弹连中牡丹台外城，堡垒胸墙被毁，速射炮也被击坏，士兵死伤甚众。日步兵乘势发起冲锋，蚁附而登。清军虽拼力奋战，仍无法压制日军火力，到 8 时 30 分，只好放弃牡丹台，向玄武门败退。

日军占领牡丹台后，即将山炮队移于牡丹台上，对玄武门进行炮击。值时左宝贵正在玄武门上督战，见牡丹台陷敌，知势力不可挽，志在必死。往日，他“每临敌，辄衣士卒衣，身先犯阵。至是，乃衣御赐衣冠，登陴督战”。部下劝他换掉翎顶和黄马褂，以免敌人注目。左宝贵回答说：“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竟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俱乎？”他还鼓舞部下将士说：“我辈厚禄重饷，安食数十年。今彼倭失约背盟，恃强侵犯，正宜名愤忠义，扫尽边氛，上纾九重东顾之忧，下救万民西奔之苦，社稷安危，兆在斯时。进则定受异常之赏，退则加以不测之罚。我身当前，尔等继至，富贵功名，彼此共之。”当时，有一门大炮原“由出洋肄业之某学生管理，未几中炮而殒”，他遂“亲自燃点”，先后发榴弹三十六颗。营官杨建胜见城上危险，“劝其暂下，宝贵斥之”。部下将士见状感奋，无不“激昂奋战”。日军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向玄武门冲击，清军则以泥土坚塞城门口，拼死防战。“日兵三突之，清兵三退之”。“敌军披靡，相顾失色”。正在酣战之际，忽来一弹，将清军大炮击毁，飞起的碎铁把左宝贵的肋部击伤。左宝贵稍作处置，裹伤再战。榴弹又击伤左额，仍“勉强撑持”。接着，复被炮击中胸前，“登时阵亡”。

“黑云萆山山突兀，俯瞰一城炮齐发，火光所到雷石官嚳，肉雨腾飞飞血红。翠翎鹤顶城头堕，一将仓皇马革裹。”左宝贵之死，是开战以来清军高级将领（时为总兵）中为国捐躯的第一人。他牺牲后，光绪皇帝亲作《御制祭文》：“方当转战无前，大军云集；何意出师未捷，上将星沉？暗鸣之壮气不消，仓猝而雄躯遽殒。”表示极度的痛悼。本来就是，何言“逐渐变成”？作为一个象征着爱国主义英勇献身精神的传奇式英雄，左宝贵成为百年来华砟几代青年守土卫国不惜捐躯的膜拜对象。就是在他洒下热血的这片土地

上，至今仍流传着一个“雨夜七星门左将军之魂显圣”的故事：据说甲午战后三年——1897 年 9 月 15 日夜里，住在平壤七星门内的年近六旬的林善华老人，正在雨夜的七星门外走着，忽然听见哪儿有马叫唤的声音，又有混杂着军靴和剑的音响。并且像幻想似的，看见雨中有个将军跨着白马，高挥着在暗淡中仍然发着白光的军刀，向北方走去。那骑白马的将军，好像曾经在哪儿见过。他慢慢地想起来了：这位骑白马的军人是前几年平壤战役的华军大将。此后，老人逢人就讲起十五夜间的事，但是听见的人一个也不相信。可是，一年的时光像流水一般地过去了。9 月 15 日又来了，这天黄昏下着雨，夜晚 10 点钟左右，通行七星门外的许多人也朦胧地看见了骑白马的军人。

尽管这是一个传奇故事，却寄托了朝鲜人民对于这位爱国将领的尊敬和怀念。

平壤陷落后的第三天，亦即 9 月 17 日，日本联合舰队又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海面上挑起了一场激烈的海战，以实现其“聚歼清国舰队于黄海”，从而夺得制海权的计划。

那是一个近乎诗意的夜晚。其时——9 月 16 日，中秋甫过，月色苍茫。大东沟一带巨舰耸立，灯火荧荧。江边，军械辎重，堆积成山。原来，当日本大举进攻平壤时，清政府决定向朝鲜济师，遂雇用轮船招商局的五艘轮船运送总兵刘盛休所部铭军 6000 人。为安全起见，李鸿章电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护航。16 日午后，船队到达鸭绿江大东沟口外。9 月 17 日又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清晨，朝霞映海，波耀黄金。完成任务后的轻松心情，使北洋舰队水兵们流露出愉快的神色。足穿上筒布靴，外衣上缀有龙徽彩钮的军官们，在悠闲地凭栏远眺，欣赏着海上景色。同平常一样，自 9 时起，舰队开始战斗操练，炮手们反复进行射击演习。据参加操练的美籍舰员马吉芬记述：“是日，朝暾晖晖，轻风徐来。晨间，舰中服务一如往昔，自午前九时起，各舰犹施行战斗操练一小时，炮手并复习射击不辍。……舰员中，水兵等尤为活泼，渴欲与敌决一快战，以雪广乙、高升之耻。士气旺盛，莫可名状。”

到 11 时许，操练刚完，厨房正在准备开饭，突然，镇远舰桅楼上哨兵高声报告：“发现敌舰！”丁汝昌登上甲板，“遥见西南有烟东来，知是倭船。”他立即决定升火以待，“挂‘三七九九’旗，命令各舰实弹，准备战斗”。于是，“各舰皆发战斗喇叭，音响彻乎全队，战斗警报震彻海空”。

了望兵发现的敌舰确是一支日本联合舰队。原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于 14 日率联合舰队由仁川向大同江口进发。15 日，到达朝鲜黄海道大东河口附近之大青岛。分别派出吉野、高千穗到大东河口，浪速、秋津洲到大同江口的渔隐洞为临时根据地，制定了一个自 9 月 16 日至 24 日，从大同江口渔隐洞根据地到海洋岛、小鹿岛、威海卫、大连湾、旅顺口、大沽口、山海关、牛庄（营口）的巡弋计划，以寻找北洋舰队进行主力决战。17 日 11 时，正在航行中的吉野发现东北方水平线上有几缕黑烟，并能辨认出是北洋军舰，遂向本队发出“东北方有敌舰”的信号。

当时，日舰共十二艘。以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艘快速巡洋舰组成第一游击队为前导，以松岛、千代田、岩岛、桥立、比睿、扶桑六舰组成本队在后，成鱼贯纵阵（单纵阵），以十海里航速向北洋舰队航进。海军少将坪井航三以吉野为旗舰，指挥第一游击队；伊东祐亨以松岛为旗舰，指挥全舰队战斗；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西京丸观战。

北洋舰队最初参加战斗的军舰共十艘，成五队，以犄角鱼贯阵迎敌。第

一队定远、镇远；第二队致远、靖远；第三队来远、经远；第四队广甲、济远；第五队超能、扬威。当望见日舰呈鱼贯纵阵逼来，并意识到似乎打算“攻击中国舰队的正中”模样时，丁汝昌下令改变阵形，“以镇远、定远两铁甲居中，而张左右翼应之，令作犄角雁行阵”。

中午 12 时 50 分，海战帷幕正式拉开。到下午 2 时 30 分以前，双方虽互有损伤，但总的看来，中方略占上风，北洋舰队仍能“维持鳞次阵形，保持舰与舰之间隔距离，以 6 海里速力整然航驶”，而日舰本队的鱼贯纵阵则已被打乱。但坚持未久，北洋舰队渐趋不利处境。

战至 3 时 4 分，定远忽中一炮，“击穿舰腹起火，火焰从炮弹炸开的洞口喷出，洞口宛如一个喷火口，火势极为猛烈”。日舰趁定远舰集中灭火之机，频频向其炮击。定远处于危急之中。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致远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命帮带大副陈金揆“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迎战来敌。于是，定远得以转危为安，而邓世昌的致远舰却被重创。

随后——3 时 20 分，19 世纪末叶最悲壮的一幕发生了：此刻，致远号已炮弹垂尽，又适与日舰吉野相遇。邓世昌见吉野恃其船捷炮利，横行无忌，便决意与其冲撞，同归于尽，以保全军的胜利。他气愤地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陈金揆深为感动，开足马力向吉野冲去。吉野骇惧，慌忙驶避，并连续发射鱼雷以自卫。不幸，致远中雷，锅炉进炸，舰身破裂。曾目睹此景的马吉芬记述道：“不转瞬间，该舰即向一方倾斜。最以勇敢著称之邓舰长世昌，早经觉悟已迫于最期，能破敌一舰，斯可以洁此生，故毅然决然出于杀身成仁之举。第敌舰所发巨弹有如雨霰，加之自舰倾斜已甚，致功业成之际遽尔颠覆，舰首先行下沉，推进器直现于空中，犹在旋转不已。惜哉，壮哉！”

邓世昌坠海后，随从刘忠跳入海中以救生圈相救，被其拒绝。有一鱼雷艇也来援救，邓世昌亦不受，坚持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邓世昌平时的一爱犬，游至身边，以口衔世昌臂，使其不沉。邓世昌又将爱犬用力按入水中，自己也沉没于汹涌的波涛之中。时年仅 46 岁。

邓世昌生前就曾多次与部下、友人表露过：“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以报国也”。他在 19 世纪末叶最悲壮的一幕中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邓世昌之死，震动朝野。光绪皇帝闻死事壮烈，极为痛悼，亲赐挽联：“此日漫挥大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谥号为“壮节”。威海卫的百姓也怀念他，集资在成山头建邓公祠，在卫城的环翠楼上立像于中堂，以志永久的纪念。

比邓世昌小 4 岁的‘经远’号管带林永升也在黄海大战中为国捐躯。他与邓世昌齐名，人称“双烈”。

1894 年 7 月底，当他听到日军在丰岛海面袭击中国军舰时，感到无比愤慨，督率全舰将士加强操练，研究战守之术。他还时刻以爱国大义晓谕部下员弁士兵，全舰上下无不同仇敌忾，准备与敌决一死战。

9 月 17 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相遇于黄海。林永升意识到久已期待的海上鏖战即将开始，遂下令将龙旗悬于桅顶，尽撤船舱木梯，以示誓死奋战。海战开始时，北洋舰队以“人”字阵形冲向敌队，经远号的位置在右翼，其右侧还有超勇、扬威两舰。超勇、扬威是两艘弱舰，各有 1350 吨，舰龄既长，航速又慢，火力及防御能力皆差。日本舰队先是佯攻北洋舰队的中

坚，但行至距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 5000 米开外，便陡然向左大转弯，直扑北洋舰队右翼之超勇、扬威两艘。日本先锋舰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连环开炮，林永升指挥经远将士协同超勇、扬威奋勇抗击。下午 1 时零 8 分，发炮击中日舰吉野号，炮弹穿透铁板在甲板上爆炸，毙伤日海军少尉浅尾重行以下 11 人，并引起熊熊大火，与此同时，日舰高千穗号也被命中数炮，损失严重。

但是，超勇、扬威两舰究竟防御能力太差，先后中弹起火。超勇号在浓烟烈火中沉没；扬威号驶离战场扑救烈火，又复搁浅。这样，经远号便突出于北洋舰队右翼之端，战斗更加艰苦。到下午 3 时 20 分，致远号沉没后，日本先锋队吉野号等 4 舰转而围攻经远。经远号被划出阵外，势孤力单，中弹甚多，火势陡发。林永升率领全舰将士沉着应战，奋勇搏敌，有进无退，一面发炮还击，一面激汲水救火，依然井井有条。吉野号等 4 艘日舰死死咬住经远，环攻不已。经远号以一抵四，毫无畏惧，拒战良久。正当激战之际，林永升发现一艘敌舰中弹受伤，舰身倾斜，便下令鼓轮追之，欲将其击沉。而日舰依仗势众炮快，以排炮猛攻经远。林永升正在指挥还击，突中一弹，当即脑裂阵亡。

林永升牺牲后，清政府表彰他在海战中“ 争先猛进，死事最烈 ”，照提督例从优议恤，并追赠太子少保，给予了很高的荣誉。时人评论说：“ 是役临阵之勇，奋不顾身，以公与邓壮节公为最。 ”

北洋提督丁汝昌是北洋舰队的最高统师。他从战争一开始就抱定了拚死到底的决心。在黄海战前，他将爱子代禧留在身边，而促其儿媳携孙返回原籍。行前，他曾对儿媳说：“ 吾身已许国，汝辈善视吾孙可也。 ”暗示生死离别之意。

1895 年初春，日军决计进击威海卫，以威胁京津。2 月 8 日，当清军大势已去，日方派人对丁汝昌劝降时，他不为所动，坚称“ 投降为不可能之事 ”，并对一些哀求生路的士兵“ 晓以大义，勉慰固守 ”。最后，——2 月 11 日为“ 救此岛民 ”，毫不犹豫地以身殉国。

近人有一首悼念丁汝昌的诗这样写道：

故垒萧杀大树凋，高衙依旧俯寒潮。

英名左邓同千古，白骨沉沙恨未消！

镇远舰管带杨用霖，也是一位追随丁汝昌为国捐躯的英烈。1895 年 2 月 11 日，当丁汝昌殉职后，杨用霖成为舰队中职位最高的将领。12 日，刘公岛内的主降将领以北洋海军水陆营务处提调牛昶昺为代表，提议由杨用霖出面与日军接洽投降。面对牛昶昺等一伙的无耻行径，杨用霖愤恨无比，当即严词拒绝，回到舰舱内口诵文天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的名句，“ 引枪街口，发弹自击 ”。

杨用霖的这一壮举，实践了他生前的诺言。平时，他就常以马革裹尸为壮，并以此鼓励部下。海战伊始，他奋然称：“ 战不必捷，然此海即我死所！ ”又转身对部属说：“ 时至矣！吾将以死报国，愿从者从，不愿从者不勉强也。 ”部下都激动得流泪，说：“ 公死，吾辈何以生为？赴汤蹈火，惟公所命！ ”

杨用霖死后，朝廷震悼，赠提督衔，予以优恤。著名文学家林纾作铭，用“ 公宜特将，顾乃偏裨，沈勇大虑，孰步公武 ”四句话来赞誉杨用霖。

“ 金戈铁马英灵在，倘借神力旋坤乾。 ”这是晚清爱国诗人黄遵宪悼念甲午英烈的诗句。是啊，甲午志士是不朽的，他们在那场战争中所表现出的

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永远是后人可借助的一种“ 神力 ”！

五、台民“誓不服倭”

中日甲午战争是否到马关议和就该划上一个句号呢？不。因为在祖国的宝岛台湾，爱国的绅士、将士和民众继续在进行着英勇的反割台斗争。

如人所知，台湾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与福建省厦门市隔海相望。那里气候温暖，土地丰腴，物产及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这一宝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居住在那里的高山族人和汉族人都是“龙”的传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古地理名著《禹贡》中就称台湾人为“岛夷”，后来遂称该岛为“夷州”。自三国始，大陆不断有人浮海东渡，特别是福建漳州、泉州的闽南人，广东潮州人和嘉应州的客家人屡屡来到这块丰腴的土地上。在他们眼中，这是一个诱人的宝岛。为了谋生，他们在这里开拓家园，并且与当地土著居民融汇在一起，把大陆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世代延袭下来。他们称大陆为“唐山”，丝毫不忘他们的祖籍在大陆，且引以为自豪，但可悲的是，对这一宝岛早已垂涎欲滴的日本侵略者在马关议和中要求清廷将其割让给它，而腐朽的清王朝竟以“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满足了日本的贪欲。于是，《马关条约》中第二条载明：中国将台湾全岛所属各岛屿永远割让给日本。

这真是奇耻大辱！4 月 17 日，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割台的恶讯传到了台湾。全台民众，“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遍于四野。”这一坏消息恰似利剑一样刺进了台湾人民的心窝。多年来蕴藏在心底的爱国之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了。第二天，亦即 4 月 18 日，台北市马上出现了“鸣锣罢市”，势将哗变的情势，丘逢甲等爱国绅士还联名致电清政府，哭诉“和议割台，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不顾身家，……何忍一朝弃之！全台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战！臣桑梓之地，义共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死后，再言割地！”其时，在京的一些台吏、翰林、举人也纷纷联名向都察院递呈：今闻“有割弃全台与倭之说，不胜悲愤！……数千百万生灵皆向北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又说：“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今一旦委而弃之，是驱忠义之士以事寇仇，台民终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隐痛矣！”

面对如此“哭声达于四野”的感人场景，任何一个有良知人都难以无动于衷。受当地爱国绅士及民众反割台情绪的影响，时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也不得不多次致电恳请清廷：“祖宗缔造之艰，史册俱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惟有与台为存亡，不敢奉皇上之诏。”又说：“弃地已不可，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民为异类，天下恐从此解体，尚何恃以立国？且地有尽，敌欲无穷，他国若皆效尤，中国之地可胜割乎？”

然而，无论是百姓哭于市，还是爱国绅士屡加痛陈，都不能使清廷回心转意。总理衙门的重臣们竟电告唐景崧：“割台系万不得已”，“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二十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这是多么令人绝望的回答呀！

“忽行割地议，志士气为塞，刺血三上书，呼天不得直。”尽管清政府出卖了台湾，愧对台民，但是，一种失去父母之邦的危机感，驱使丘逢甲等

爱国绅民挥毫写下血书，表示“誓不服倭”，并再次抨击皇太后、皇上及众廷臣：“倘不乘此将割地一条删除，则安心弃我台民！”由于台民意识到通过朝廷“事难挽回”，只好向总理衙门郑重声明：眼下台民犹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易极”，既然“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台湾士民自发的抗日斗争就此轰轰烈烈展开。而日军也悍然开始实施割台的入侵。进犯的日军分两路进攻，一路是总督府直属部队，由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海军大将亲自指挥，合计 12348 人；一路是近卫师团，由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率领，合计 15769 人。

6 月 3 日下午 5 时左右，部分日军突入基隆市街。唐景崧闻此消息，犹为惊弓之鸟，遂于第二天竟弃前方将士于不顾，携巡抚印自台北逃往淡水，接着又乘德船鸭打号内渡厦门。丘逢甲闻讯后，痛斥唐景崧“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

唐景崧一逃，台北一片混乱，日本军队乘虚而入，于 6 月 7 日拂晓占领台北。丘逢甲见势难支撑，遂与林朝栋离台内渡。临行前，丘逢甲曾写下满腔悲愤的《离台诗》六首，其中“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卷土重来未可知……海上谁来建义旗”等句，寄托了台湾回归祖国的无限热望。

就在台北官僚伸士们纷纷内渡潜避之际，台中、台南人民浴血奋战在抗日最前线。6 月 11 日，亦即日本近卫师团集结于台北城的同一天，台中义军首将吴汤兴在新竹城外誓师抗敌。吴本是苗栗秀才，早在日军来犯台湾前，他就曾写诗云：“闻道神龙片甲残，海天北望泪潸潸。书生杀敌浑无事，愿与倭儿战一番！”台北失陷前，他任台湾府义军关防。此次列营祭旗，他发誓“是吾等效命之秋也？”。各路义勇和清军诸营为他的献身精神和抗战决心所感奋，纷纷表示誓死御敌，因吴汤兴义军大都来自新竹、苗栗二县，故又称“新苗军”。誓师后，新苗军便在新竹城北 25 里的大湖口扎营，以狙击南侵日军。

当时，南侵日军分两路向前推进。一为东路，循山路行进，经大科崁（今大溪）至龙潭坡（今龙潭）；一为西路，循官道行，经桃仔园（今桃园）、中坜、安平镇（今平镇）、杨梅坜（今杨梅）至大湖口。为狙击日军，吴汤兴也将义军兵分两路。他亲率西路军截击西路敌人，手下强将徐骧率队狙击敌东路军，吴汤兴率领的西路军自大湖口出发后，探明了敌人的行进路线，在途中设下埋伏。6 月 14 日，“西路日军适至，相遇，各开炮火。日军恃众，惟发排枪，弹如雨下，鲜命中。吴军多山民，善狙击，弹无虚发，日军仆者相续，遂大败退”。

日军原以为义军不过是乌合之众，不难一举荡平，没想到在新竹城外遭到如此大的败绩，因此，再也不敢慢怠了。6 月 22 日上午 11 时，日军阪井支队又进至新竹城下，他们先以机关炮队发炮掩护，步兵随即发起冲锋。吴汤兴义军“非素练，又苦饷械不继”，虽奋力抵抗，毙伤敌人 14 名，但终因抵不住日军的猛烈轰击，牺牲 50 余人。为避免过多的伤亡，只好暂时撤出城外。11 时 45 分，日兵攀城墙而入，打开城门，大队拥进城内。

新竹虽然失陷了，但义军在狙击中的英勇表现，却使某些没有内渡的地方官员又看到了守土保国的希望。他们在台湾知府黎景嵩的召集下，召开了台湾、彰化、云林、苗栗四县官绅会议，筹款守御，并开设筹防局，招募土客兵勇 7000 人，取名“新楚”军，以当地守军分统杨载云（又作杨紫云或杨再云）为统领。于是，新苗与新楚两支义军顿时活跃在台湾中部抗日斗争的

战场上，使侵台日军被牵制在台北、新竹间达二个月之久。杨载云、姜绍祖等志士先后为祖国捐驱，在保卫台湾神圣领土的战斗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 8 月初到 9 月下旬，台湾义军的抗日斗争进入更艰苦的阶段——台中地区保卫战。

在 8 月 13 日狙击日军进犯苗栗的战斗中,黑旗亲兵营管带袁锡清和帮带林鸿贵“身先士卒，屡冲敌锋”，不幸连中数弹，“鲜血洒鞍辔”，双双阵亡。

在 8 月 28 日彰化城东八卦山战斗中，吴汤兴手持短枪，足登草履，大呼杀贼，毫无惧色地血洒疆场。吴汤兴牺牲后，在他处督战的统领吴彭年见八卦山竖起日旗，马上勒马亲率黑旗军七星队 300 人回救。行至山下，山上敌弹击中吴彭年，他虽奋力向前，终不支而壮烈殉国。后来，有人作诗《哀季子歌》悼念他云：“巨炮雷轰力劈山，榴弹雨下响匉訇，身中数枪靡完体，据鞍转战莫敢樱。血溅衣襟溘然逝，凛凛面色犹如生。…人居世上谁无死？泰山鸿毛权重轻。”

日军在台中地区得手后，又马不停蹄地水陆并进，夹击台南，……

10 月 19 日，日军对台南最后一道防线曾文溪发起攻击。义军首领徐骧协同黑旗军在此力战扼守。当敌炮击中徐骧时，他竟跃起而呼：“丈夫为国死，可无憾！”徐骧殉国后，总兵柏正材也随之阵亡。

台南是 10 月 21 日失陷的。尽管一个星期后，也就是 10 月 27 日，桦山资纪发布告示声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但是，桦山资纪未免高兴的太早了。因为后来的史实表明，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台湾从未真正在日本占领军的铁蹄下“平定”过。

六、从睡梦中醒来

堂堂“天朝——地大十倍之中国，为什么不敌一小国日本”，“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刻”呢？

有人认为，当昔日被鄙视的“岛夷”、“弹丸岛国”入侵时，把持清朝国权的慈禧一伙不作认真抵抗，仅是被迫应付而已——中国不败才怪呢。

这种说法确有一定的道理。那一年，恰逢慈禧太后的六旬大寿来临。还在两年前，她就指派首席军机大臣世铎“总办万寿庆典”。世铎把庆寿活动视为高于一切的头等大事，派出大批人马采办寿品。据记载，“万寿庆典”的耗资是相当惊人的。仅给慈禧备办龙袍、龙褂、氅衣、衬衣、各色蟒缎、大小卷缎绸等衣物面料一项就耗银 23.2 万两。为了粉饰太平，自颐和园到西华门，沿路还搭建了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及点设景物等，耗银多达 240 万两。此外，备办玉册、玉宝、金辇、轿舆、宫廷点缀和修缮、筵宴、演乐、唱戏、赏用物品也耗去不少银两。据有人统计，这次“万寿庆典”，共挥霍白银不下 1000 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岁收入的 1／6，而这些银两有的竟是挪自“边防经费”和“铁路经费”。当战争打响后，慈禧虽也假惺惺地发布懿旨：“自六月后，倭人肇衅变乱，藩封寻复，毁我舟船，不得已兴师致讨。刻下，干戈未戢，征调频繁，两国生灵均罹锋镝，每一思及，悯悼何穷！……兹者庆辰将届，予以何心侈耳目之视，受台莱之视耶？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礼，宜即行停办。”但这仅仅是官样文章。事实上，“庆辰典礼”的活动仍在极其铺张地进行着。11 月 7 日，亦即日军攻陷大连的当天，迎来了慈禧的六旬“整寿”。于是，一幕咄咄怪事出现了：当国土沦陷，人民遭难之际，慈禧却在禁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并连续放假三天赏戏。

当时，人们当然不敢直接指责慈禧，而是把矛头指向她的臣下。战争刚结束，不少京官把责任都归罪于李鸿章一人。有的说，李鸿章“以洋人得功，遂终身以洋人为可师”，“此次战争实为李鸿章因循怠弛所酿成”。有的说，“李鸿章志存和局，致清将观望不前”。有的骂李鸿章“老悖糊涂之人”，是“内奸”。有的说日本之所以“明目张胆如此之横者，皆李鸿章与之狼狈为奸”。有的甚至认为李鸿章“国人皆曰可杀”，提议“应请立加罢斥，以儆奸邪”。像类似的指责，痛快倒是痛快。但是，难道去掉一个李鸿章，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吗？也有人感到这不过是痴人说梦。因为当李鸿章被光绪皇帝“剥去黄马褂，拔去眼翎”，取而代之的湘系诸将也没有挽回败局。吴大徵率兵出关时，曾大言不惭地声称胜利在握，但一到战场上就变成了一个可耻的逃兵。黄遵宪有《度辽将军歌》讽讥他说：“闻鸡夜半投袂起，檄告东人我来矣！此行领取万户侯，岂谓区区不余界？将军慷慨来渡辽，挥鞭跃马夸人豪。平时搜集得汉印，今作将印悬在腰。”主帅刘坤一“顿兵于关门而毫无振作”，竟连一次仗没有指挥打过。对于他，也有人评议说：“刘坤一驻山海关，一日讹言倭兵至，坤一惧而三徙，其悖谬如此。”

还有人指出，光绪和翁同龢虽是战时有名的主战派，但懦弱的皇帝丝毫不敢违抗太后的意志。他的老师翁同龢也从未提出过像样的扭转颓局的主张，仅仅满足于军事失败时给李鸿章以这样那样的处分，从而发泄对李的一向不满。等到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李鸿章赴日议和归来，他们也对和约噤声不响，承认了既成事实。所以，难怪其时有人嘲讽帝党：“军书旁午日苍黄，

常塾司农访鹤忙。从此朝廷添韵事，风流不让半闲堂。”常塾即翁同龢，半闲堂是南宋权奸贾似道的住所。时人把翁同龢视为贾似道一类的权奸人物。

其实，指责慈禧也罢，归罪李鸿章也罢，批评吴大徵、刘坤一也罢，挖苦光绪和翁同龢也罢，说到底，中国惨败，宫廷腐败和前线将领指挥不能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更关键的是，总体国力不如人——用某些外国观察家的话说——中国“正躺在死亡之榻上”“奄奄待毙”，才是忍痛受屈辱的根本原因。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有言道，灾难可以兴邦。为了苟且偷生，千疮百孔的清廷纵然可以用赔巨款和割重地来换取苟延残喘，继续运转自己的统治机器。但是，众多的炎黄子孙不愿眼巴巴看着父母之邦重蹈印度、越南、缅甸的复辙而成为一个殖民地国家；不少有识之士经过屈辱的当头一棒，意识到必须发愤图强，切莫再高枕无忧了。戊戌老人张元济曾这样回忆道：甲午惨败使“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丙申年（1896 年）前后，我们一部分同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

还在《马关和约》刚刚签订的日子里，正在紫禁城应试的康有为——后来的维新派大师，就叫他的学生梁启超鼓动各省举人向清廷上书，反对议和。4 月 22 日，在梁启超的带领下，广东的 80 多名举人到都察院联名上书，请求转呈皇帝。接着，其他省籍的举人也纷纷仿效。几天之内，昔日冷落清静的都察院门前，变得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成为爱国士子们慷慨议政的场所。康有为看到“士气可用”，便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他用时一天两夜，一气写成一份 1.8 万余字的“上皇帝书”，叫梁启超、麦孟华（也是康的学生）分头抄写，让人们传阅。短短几天内，这封万言书传遍京都，激起人们特别是爱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5 月 1 日，康有为在北京宣武门的松筠庵召集十八省举人开会，号召大家签名，到会者受其感召，签名者达 1200 余人。

就在懦弱的光绪皇帝批准《马关条约》的当天，爱国的举人们又在松筠庵集会。这天午后，晴朗的天气骤变，狂风怒吼，大雨倾盆，雷电交加，冰雹乱打，给本来就已悲郁沉痛的会议，增加了愁惨惨、凄切切的气氛。与会者触景生情，感怀国家的危局和民族的苦难，悲愤填膺，痛哭失声。室内的哭声与室外的风声、雨声、雷声、冰雹的敲击声混成一片。天气转晴后，举人们在康有为的领导下，再次成群结队前往都察院上书。

在“万言”上书中，康有为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等项主张。所谓拒和，就是反对签订卖国条约，不割地，不赔款，坚决抗战。康有为抨击屈辱求和的政策是抛弃人民、散天下民心的政策。这种政策必将导致人民背离朝廷，国家土崩瓦解。他警告说：抛弃台湾人民的事小，散天下民心的事大；割地的事小，亡国的事大。如果各国侵略者都仿效日本的办法侵略中国，朝廷也照样答应他们的要求，中国就会迅速灭亡，所以千万不能签约以求目前的苟安，置国家的前途于不顾。他建议光绪皇帝立即下一道“罪己诏”，代表朝廷向全国老百姓作一次自我批评。并严厉惩办那些昏庸无能丧权辱国的大臣和作战不力丧师失地的将帅，以鼓舞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志，洗雪国家的耻辱。

所谓迁都，就是把首都从北京迁到西安。康有为认为，由于旅顺和威海卫相继失陷，北京已失去了海上的屏障，在陆路方面也无险可守，敌军随时都可以侵入北京。这次和议既成，列强的海军更可以长驱直入天津、大沽，

进窥北京，所以把首都仍然设在北京是非常危险的。他回顾五十年来的历史，指出外国侵略者曾经多次威胁京畿，而朝廷为了保存首都，多次向敌人求和，以赔款、割地、丧权辱国换得首都的苟安。这种为“区区十里之城”而抛弃“千里之地”和千百万人民的做法，是一种下策。如果照样下去，必至割尽十几省的万里土地，弃尽天下数万万人民，后果实在不堪设想。所以康有为极力主张把首都迁到远离沿海、有险可守的古都西安，作长期抗战的准备。

康有为还建议，把 2 亿两对日赔款改为对日作战的军费和实行改革的费用，挑选有用的将才，购买外国新式武器，用西洋的办法训练军队，加强战备。

在康有为看来，拒和、迁都、练兵只不过是对付敌人的权宜之计，而国家富强的根本大计就是变法。所谓变法，就是改变旧有政治和经济制度，建立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他指出，清朝的制度是沿袭几百年前明朝的制度而来的，现在已腐败不堪，根本不适应那一历史时期列国并立争雄的世界大势，非实行变法不可。于是，他主张：变法要以“富国为先”。富国的措施有六项，就是发行纸币，修筑铁路，采用机器和轮船，开发矿产，铸造银币，开办邮政。他认为只要采取这六项措施，国家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此外，康有为还主张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宫制，并使民众富足，民情“通达”等等。

康有为的这份万言书，既反映了人民要求挽救祖国危亡的迫切心情，又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和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开明地主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改革政治制度的强烈愿望。当时的请愿运动虽没有成功，却在全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以“公车上书”的名称载入史册，成为 1898 年戊戌维新运动的前奏。

另一位近代维新思想启蒙大师——严复，则以马关“和议始成”，大受刺激，“自是专力于翻译著述，先从事赫胥黎之《天演论》，未数日而脱稿”。在翻译过程中，他常加按语，阐发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同为“天演”思想。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与天争胜”的原理，唤醒人们顺应天演的规律变法维新，以达到“自强保种”，避免沦于亡国灭种的危险。严复的这一警世之作，给古老呆滞的中国社会和思想界注入了强烈激素。正是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感到生活在这竞争世界上的压力和威胁，开始认识到中国要在列强环逼之下争强保种，就“必当先明在对外界之说，即与吾群竞争之公敌何在也”；也认清了“与吾群竞争之公敌”就是侵略我国的外国资本主义。

当时，还使一些人从中日对比中看到经济变革的重要性，立志走实业救国的道路。状元出身的张謇则醒悟到：“看看中国国势，一天比一天危迫……想到日本是一个小国，何以反走到中国前面去？……因此，就推想到要中国不贫不弱，救醒他起来，除掉振兴工商业，决没有第二样办法。”于是着手筹办了大通纱厂。另外两位状元及第的孙家鼐、陆润庠也于甲午后投资办起工厂来。

总之，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深重的民族灾难往往可以促成一个民族的觉醒和奋起。中国甲午战败虽在近代史上写下了最黑暗最屈辱的一页，但它又构成一个新的历史转机——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于是，自此以后，新的社会思潮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爱国救亡运动，在神州大地上广泛开展起来……